

文物大省百年考古历程的集中呈现

——《河南考古百年志》读后

孙凯

河南地处中原,扼东西南北交通之要冲。境内群山起伏,大河纵横,平原辽阔,深得天时地利之便。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由于王朝的兴衰,战争的频仍,人民的迁徙,河南又成为各民族交融融合的熔炉,漫长的历史岁月过去了,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造就了一方神奇的考古热土。

早在1921年,受聘于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业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带领在河南渑池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第一次找到了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远古文化的遗存,其后被命名为仰韶文化,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1928年至1937年,更有一批中国学者主持的安阳、浚县、汲县、辉县、永城等多项考古发掘。其中长达10年的安阳殷墟发掘,不但发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宫殿、作坊、王陵大墓和无与伦比的青铜器、玉器、甲骨文,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把中国的信史提早到了3300多年以前,而且还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培养了很多考古发掘和研究人才,使中国现代考古学成为一门新兴的科学。新中国成立后,更是迎来了考古学的黄金时代,配合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河南开展了多次文物普查和大量考古发掘,有很多名满全国的考古大发现。《河南考古百年志》主编杨育彬是一位老考古人。自1961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河南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参与了多项大型考古发掘,在考古学研究上也颇有建树,2022年被授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终身学术成就奖”。如今,耄耋之年的杨老先生又主编了这套大部头的考古志书,令人敬佩和欣喜。

《河南考古百年志》套书共有三本。第一本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发现篇》。在20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掘一百周年到来之际,权威部门专家评选出河南百年考古100项大发现。书中对这些重要发现逐一进行了介绍,同时还记述了河南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遗址等考古发现。这些已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里程碑上耀眼的存在。

第二本是《筚路蓝缕百年路,迭代赓续薪火传——人物篇》。一百年来在河南进行考古的队伍中,有1921年安特生在渑池仰韶村的考古发掘;1928—1937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刘耀、高去寻等考古前辈在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1932—1936年郭宝钧、赵青芳、刘耀、尹焕章、孙文青、李景昉等在浚县、南阳、辉县、永城等地的考古发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夏鼐、徐旭生、郭宝钧、安志敏、赵芝荃、林寿晋、郑振香、杨锡璋;高等院校考古专业的苏秉琦、宿白、邹衡、李伯谦;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和各地市文物部门的安金槐、蒋若是、许顺湛、裴明相、李京华、廖永民、黄明兰、郝本性、郑杰祥、杨育彬等在河南进行过考古发掘。如今更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活跃在河南考古第一线。大量的文博单位,数以千计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支撑着河南的文物考古事业。在多次征求有关专家、领导的意见之后,几经反复,书中列出了一百年来对河南考古有过突出贡献的百位考古老前辈。老考古人和部分中年学者,他们只是河南文物考古队伍的部分代表。

第三本是《百年恰风华,世纪正青春——纪事篇》。这是自1921年到2021年一百年间的河南考古纪事,也可以说是一部河南现代考古学编年史。这些考古发掘的对象可能是名满天下的大遗址,也可能是简单的几座古墓;发掘的主持者有的是大师级考古老前辈,也有的是县里文管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处遗址的考古发掘时间有的持续几十年而延续至今,有的仅十天半个月。这些考古发掘的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考古故事,记述着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与我们祖先的对话,最后叠加成一座河南百年考古的丰碑。

第三本书的最后是附录。包括河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河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and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遗址和墓葬部分的名录,显示了河南丰厚的文化底蕴;另有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20世纪河南十项重大考古发现,20世纪全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河南年度五大考古发现等名录,足以彰显河南考古发现大省的地位和实力。

《河南考古百年志》套书为大16开本,《发现篇》约87.1万字,《人物篇》约54.4万字,《纪事篇》加附录约109.4万字。虽然不能说是皇皇巨著,但也堪称大部头了,是至今不多见的河南考古史典籍。我觉得全书至少可以归纳出三个特点。

一是选题重要,很有现实意义。2021年10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河南省人民政府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办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大会宣读了国家领导人发表的贺信,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 and 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河南考古百年志》套书正是河南百年考古成果的汇报,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古代中国。

二是《河南考古百年志》套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如上介绍,《发现篇》概述了河南百年来100多项重大的考古发现和成果收获。《人物篇》介绍了百年来100位考古老前辈、老考古人、中青年学者在河南的考古经历、学术成就和道德风采。《纪事篇》记录了自1921年到2021年百年来考古发掘的历程,这些考古发掘留下了千百位考古者的足迹。

三是《河南考古百年志》套书图文并茂,印刷精美,装帧规范,版式落落大方,颇有创新意义,堪称考古专著中的精品。其中《发现篇》的封面用商代青铜器饕餮纹、连珠纹图案装饰,《人物篇》则为“考古百人团”的头像,《纪事篇》的封面用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而三本书的封底图片分别为郑州出土商代大型铜方鼎、铜圆鼎和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钵,这三件器物均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出土的文物精品。

最后,很有感触的是,杨育彬先生说,1961年他大学毕业时,同学们提出“要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这是年轻学子的心愿,也是对祖国母亲的承诺,他做到了。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杨育彬先生仍笔耕不辍,择一事,终一生,已将生活与考古融为一体。近几年内,为编写《河南考古百年志》,他翻阅了上百篇考古发掘报告,细读了几十部考古学术专著,每天多是早上6点前起床,晚上10点后入睡,青灯黄卷,坐在电脑前用汉王笔打字。手写的草稿,打字初稿,修改的样稿,叠起来,厚可盈尺,酸甜苦辣,均在不言中。看到成书,他热泪盈眶,用行动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座右铭。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考古百年志》
编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主编:杨育彬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1月

自1926~1927年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组织的中亚考察队在云南省元谋县龙街村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以来,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然而与其他地区星光灿烂的新石器文化相比,金沙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显得黯然失色,以至于学界对其知之甚少。这种情况反映出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的都比较薄弱,未能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其根本原因在于金沙江流域迄今为止尚未出版大部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众所周知,田野考古工作是获取考古学研究资料的重要手段,但考古调查或发掘报告未出版就意味着田野考古资料未公布,学界和公众就无法利用这些资料开展相关研究。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面临的正是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其实,经过几代考古人近百年的努力,金沙江流域已发掘了几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为配合向家坝、白鹤滩、乌东德、鲁地拉等大型水电站以及成昆铁路复线等工程建设,云南、四川两地的考古工作者在金沙江两岸发现和发掘了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的就有会理猴子洞、河头地、大坪、河东田、马鞍桥、西昌新庄、羊耳坡、武定长田、江西坟、以鸡嘎、元谋腊甸、丙洪、永胜堆子、枣子坪等十几处,其中河头地、大坪、河东田、马鞍桥、江西坟、长田、腊甸、堆子等遗址的发掘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河头地、大坪、河东田更是超过了20000平方米。然而遗憾的是,这些遗址目前均未出版发掘报告,仅有长田、大坪、河头地、新庄、羊耳坡、枣子坪等为数不多的几处遗址发表了发掘简报。这无疑大大限制了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迄今为止,放眼整个金沙江流域,即便是材料相对丰富、研究相对较多的金沙江中游地区也未构建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对各类遗存的文化面貌及其时代、性质等问题的认识都十分模糊。尽管最新的研究将金沙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分为早晚两个阶段,其中又各自区分出几类遗存或“文化类型”,然而这些遗存或“文化类型”究竟是同一种文化的不同类型,还是不同的文化,它们之间的纵向传承关系和横向交往关系如何,目前也都还不清楚,甚至对某些遗存是否属于新石器时代都还未取得一致的认识。这种情况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对新发现的遗存的分期与年代,是否属于新石器时代以及属于哪个文化,发掘者似乎不敢做出明确判断。例如,2019年发掘的元谋县腊甸遗址,发掘者认为④~⑦层属于早期文化层,某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未对该遗址的分期以及各期的年代、性质做出明确的判断。从简报公布的几张器物照片来看,遗址出土的单横耳罐与巧家县小东门、宁南县钟家梁子墓葬出土的同类器完全相同,应当代表了一种青铜时代文化,一些陶片饰绳纹,附加堆纹或以点线纹和光面组成的复合纹饰,与元谋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片相同,明显应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大墩子文化。以单横耳罐、侈口双耳或无耳罐为组合的遗存,在多处遗址和墓地都有发现,应当可以命名为某种考古学文化,譬如可以用最早发现这种遗存的小东门墓地将其命名为“小东门文化”,但迄今学界尚未提出相关命名。关于大墩子文化,目前学界争议较多的是大墩子遗址晚期遗存特别是其中的土坑墓和瓮棺是否属于新石器时代,是否属于大墩子文化,再如会理河头地遗址,发掘简报将该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两组,根据与周边地区出土遗存的比较,将两组的年代分别定为距今3800~4300年、4800~5000年,但对于各组的性质未加判断,只提出第一组遗存与安宁河流域诸多遗址类似,存在交流,第二组遗存与猴子洞、李家坪等遗址出土的早期遗存既有类似又有区别,属于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存,至于它们是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还是不同的文化,应当如何命名,都没有明确的意见。

以上问题都凸显了出版一部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对于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来说,《敝家堡遗址发掘报告》的出版无疑是一座里程碑。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为确认金沙江流域其他遗址出土新石器遗存的性质和年代树立了一个可靠的标尺。金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虽然已有“大墩子文化”“白羊村类型”“喇叭山类型”“横栏山文化”等命名,但因资料较少,或因出土资料含混而未准确把握文化面貌,或被新发现的资料证实为青铜时代遗存,都难以作为比较的标尺。敝家堡遗址经过4次发掘和1次试掘,揭露面积2500余平方米,新石器时代堆积包含②层至最底层的原生堆积以及房址24座、灰坑183个、灰沟5条、器物坑4个、墓葬15座、特殊遗迹20个,遗迹类型多样、数量较多,出土器物特别是陶器十分丰富。报告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两期,第二期又进一步分为四段,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报告公布了141例晚于十四滩年组的测定结果,出自新石器时代单位的就有108个(不包括4例无法满足实验需要的样品)。一个遗址短期中发表数量如此之大的新石器时代碳十四测年数据,放眼全国都是十分罕见的,就连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历经30余年(1974~2006年)也才测定了78例样品。除了数量多之外,发掘者还特别注意系列样品的采集要求,采样单位不仅涵盖了各个年度不同发掘区的每一层和绝大部分遗迹,并且大部分单位都测定了2个以上的样品,高精度系列样品方法保证了版

家堡遗址所测数据的高质量 and 可靠性。敝家堡出土的两期新石器时代遗存在目前已发表的、各自所代表的同类或近似的遗存中都是最丰富的,文化面貌均比较清楚,文化性质不同,其早晚关系既有层位学证据,又有部分年代学支撑,为金沙江流域特别是中游地区其他遗址出土新石器遗存性质和年代的判断提供了可靠的比较材料。

第二,为金沙江流域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提供了一个样板。敝家堡遗址于2015年试掘,2016~2019年四次发掘,距发掘工作结束仅时隔5年就出版了3卷本考古发掘报告,在考古报告普遍积压、欠账的今天,这种速度是十分罕见并且难能可贵的。尤其值得称赞的是,报告编写者并没有因为整理资料、出版报告的时间短促而在编写质量上有所妥协。报告虽然采用的是按单元发表遗物的方式,但对出土遗物也进行了全面的类型学分析,报告附录还公布了动物遗存、植物遗存、微体植物遗存研究报告,为研究者提供了该遗址的全方位信息。

系统、全面、准确、客观地公布田野考古工作所获资料,是考古报告所担负的基本使命。就此而言,《敝家堡遗址发掘报告》不但完成了这一使命,并且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研究,堪称优秀。不过,任何一部考古发掘报告都不是完美无瑕的,《敝家堡遗址发掘报告》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报告未明确两期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性质。报告仅指出第一期与猴子洞早期遗存、李家坪早期遗存、河头地早期遗存、堆子遗址第一期、银梭岛遗址第一期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第二期与枣子坪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堆子遗址第二期遗存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然而除了枣子坪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被发掘者认为是属于白羊村文化外,其余几处遗址的发掘者均未对各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属性做出明确的认定或提出文化命名。其实,敝家堡遗址的发掘者曾撰文将第二期遗存命名为“敝家堡文化类型”,认为其与“大墩子文化类型”“白羊村文化类型”“新光文化类型”“横栏山文化类型”共同构成了“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发掘者显然已经注意到敝家堡第二期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或类型,但报告未就此方面的认识展开讨论,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第二,报告将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两期,第二期又进一步区分为四段,各期各段仅列举了若干代表性单位,未涵盖新石器时代全部遗迹,并且在遗迹登记表中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全部登记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没有具体到时段。此外,测年数据登记表也未注明样品出土单位的时代,不少单位没有被列入报告所分各期段,研究者需要逐一确认各单位的时代和期段,使用起来颇为不便。

第三,动物遗存只提供了研究认识,而未公布各单位出土动物骨骼的鉴定结果。就该遗址新石器时代动物遗存而言,动物遗存研究报告提供的是新石器时代先民开发与利用动物状况的认识,对于该遗址两期五段、时间跨度长达13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来说,这一认识显得十分笼统。此外,该遗址两期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性质并不相同,其他研究者无法根据这一研究进一步了解每一期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动物开发与利用状况。

尽管报告存在一些瑕疵,但瑕不掩瑜,作为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部大部头考古发掘报告,《敝家堡遗址发掘报告》以其全面、丰富的资料 and 可靠的分期与年代标尺,必将引领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迈入新时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进程研究”(项目编号24XKG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敝家堡遗址发掘报告》(全三册)
编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西南夷考古的最新力作

——《师宗大园子墓地》评介

张晓超

2024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师宗大园子墓地》(以下简称《大园子》)正式刊行。作为西南夷考古的最新成果,《大园子》不仅是滇黔桂三省区交会地带的考古发掘报告,填补了西南夷人群分布的地域空白,而且也为进一步研究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土著青铜文化谱系与族群互动、社会演进等诸多学术议题提供了全新材料。

大园子墓地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会地带的滇东高原,位于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漾月街道新村社区新村下寨,系一座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堆墓地,分布面积约7000平方米,2015—2016年间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对该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350平方米,清理墓葬402座,出土各类器物600余件(组)。

《大园子》分上下两册,主体部分由绪论与上编“田野考古报告”、下编“科技考古报告”组成。通过仔细阅读,我认为该报告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编撰体例科学严谨。报告对出土遗存的介绍既有综述,亦有分述,结构清晰,秩序井然,尤其墓葬分述中按墓葬单位逐一介绍随葬品,把随葬品还原到各个墓葬当中,器物真实埋藏情境与遗迹相互关系一目了然,极大的方便了读者阅读和使用。同时,田野考古报告与科技考古报告各为一编,后者不再仅作为附录,而正式与田野考古报告共同成为了报告的两大部分核心内容,这一体例完全适应了当代科技考古深度融入考古研究中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为未来类似遗存的报告书写提供了相应参考。

第二,资料公布全面系统,综合阐释言之有据。报告以墓葬综述、出土器物、墓葬分述,主要认识与墓葬登记全部部分、全面、系统、准确地公布了大园子墓地的全部田野资料,行文连贯、语言洗练,阅读过程中无不感受到编写者深厚的学养与文字功底。在呈现形式上,830余幅图片、30多个表格、230余幅图版与文字表述有机结合,详尽揭示了大园子墓地的方方面面,报告在主要认识中对大园子墓地的分期、年代、文化特征、族属及其他社会历史信息进行了多维度的综合阐释,清晰展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大园子人群社会发展的生动场景,“透物见人、以物论史”的学科目标得以进一步凸显。

第三,注重细节。报告无论文字还是图片均注重对细节的表现,如墓葬形制与随葬品形制、纹饰的细部特征以及随葬品组合方式、位置关系等,显

然也只有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才能捕捉到各种细节。这是考古工作精细化的具体表现之一。对于细节的重视一方面可使读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考古材料,另一方面也为相关专题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如对器物纹饰细节的强调将直接有利于相关纹饰艺术研究。同时,考古学研究中,宏观认识的提出往往也离不开微观证据的不断积累,故而考古细节无论对专题还是宏观研究都至关重要。

第四,多学科交叉研究卓有成效。报告对出土材料开展了广泛的科技检测与研究,取得了众多新的认识。如对铜器的检测显示大园子人群在早期就有使用专供矿料来进行专门化生产的行为,其矿料有两个以上的来源地,分别来自滇东北和滇东南;对特殊材料制品的检测显示大园子人群已掌握桦树皮焦油的生产工艺,并且已将其用于装饰领域,这是大园子墓地的重要发现,同时也是我国考古工作中的首次发现。科技手段的深度介入大大突破了传统考古对考古遗存的“单一”叙事,从而实现了了对考古遗存的“多线”叙事,显著提升了考古材料的研究价值。

21世纪初,《中国文物报》曾就“什么是理想的考古报告”发起专题讨论,众多学者先后就心目中理想的考古报告提出意见。整体来看,尽管学者们看法不一,但考古报告应全面系统、实事求是地公布全部考古资料,以便于读者研读利用却是普遍共识。考古报告作为对田野考古取得成果的报告书,亦作为田野工作的终点与后续研究的新起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想一部理想的考古报告既应全面无遗漏地公布田野收获,也要有助于学术进步,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奠定基础。以此对照《大园子》,可以发现其兼具翔实性与学术性,编写者在翔实发表材料的基础上,对涉及的一系列学术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考古遗存由此实现了从无形叙事到有形叙事的飞跃,“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话”的学术追求于此亦充分展现。因此,据上统观,《大园子》无疑是一部符合考古学学科发展要求的、理想的考古报告。

20世纪50年代,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快速发展,一大批土著青铜文化遗存的出土为系统了解西南夷的真实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契机,由此也促使学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西南夷地区的古代文化。时至今日,云贵高原的考古发现已呈蔚为大观之势,云贵高原早期文化积淀之丰厚早已不言自明,各地西南夷土著遗存纷纷涌现,师宗境内的大园子

墓地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

在文化构成上,大园子墓地兼具滇文化、八塔台文化、石榴坝文化与自身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此反映出大园子人群在自身文化特征基础上与同时期的周边人群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文化交往。结合地域进一步观之,可以发现师宗大园子墓地不仅是诸文化的汇聚地,更是诸文化传播扩散的重要中继区,如滇文化经师宗坝子一带继续向东辐射,直至北盘江沿岸地带;八塔台文化通过师宗坝子向与石洞村、大逸圃人群互动交流等,其作为文化通道的重要价值尤为凸显。“毁器”是西南夷人群中一种颇为奇特的丧葬习俗,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该葬俗在盐源老龙头、袁川古底、个旧麻玉田、元江打箐陡及师宗邻近的陆良薛官堡、泸西石洞村、大逸圃等墓地中都有所发现。大园子墓地中也有40多座墓葬发现毁器现象,年代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持续到西汉中晚期,涉及器物有铜剑、戈、矛、削、刀、玉管、珠、陶纺轮等,毁器形式有折弯、折断、打碎、火烧等多种,就铜器而言,经测定似有先焚烧后毁器的顺序。由此可见,一,大园子人群毁器应系西南夷人群毁器文化之重要一端,其兴起或与族群互动、文化传播密切相关;二,毁器在大园子人群中具有一定的流行度,但并非所有墓葬都是如此,其可能与墓主身份或死亡方式存在关联;三,毁器在大园子人群中有一定的沿用性,持续使用时间跨度大,据墓葬登记表来看,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毁器葬共有16座,西汉中晚期有28座,这或表明,毁器葬在西南中晚期较之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更为流行。学界一般认为,“毁器”葬与鬼神崇拜、灵魂不灭或“鬼器”观念相关,因此,大园子人群的毁器意图很可能是某种形而上的思想观念在丧葬器用上的具体呈现。另外,M58中的疑似殉人迹象也颇值得关注,据笔者目前所见,晋宁石寨山、官渡羊甫头、呈贡天子庙、宜良沙帽山、盐源老龙头等土著墓地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殉人现象。大体来看,殉葬基本都发生在大型墓中,如羊甫头M113、天子庙M41、老龙头M6等,那么以此反证,M58墓主很可能在大园子人群中地位较高,故得以殉人。同时,殉人对于了解大园子人群社会性质与结构也大有裨益,一般情况下,墓主为主,殉者为仆或为奴,显然这已构成了两级的社会阶序。

总之,大园子墓地的发掘和《大园子》的刊布为深入探索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人群分布、族群互动、丧葬习俗与社会演进等诸多内容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考古学材料,同时也对完善滇东高原乃至云贵高原土著青铜文化谱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坚信,作为西南夷考古的最新力作,《大园子》将进一步推动西南夷考古的高水平发展。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考古文博系)

《师宗大园子墓地》(全二册)
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曲靖市文物管理所
师宗县文物管理所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师宗大园子墓地》(全二册)
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曲靖市文物管理所
师宗县文物管理所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里程碑——《敝家堡遗址发掘报告》读后 何强